

蒙族豪士吳鶴齡

胡格金台

民國十八年筆者就讀東北蒙旗師範學校時，常在「東北蒙旗旬刊」讀到有關吳鶴齡先生在南京政界的貢獻，便非常敬慕吳先生的為人，惜無緣識荆。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在西蒙西蘇尼特嘉卜蘇爾初晤吳先生，因為時間短暫，未得深談。民國三十九年六月筆者來台定居屏東市，與吳鶴齡先生同住一地，時相過從，始知吳先生在抗戰時期為國家民族奮鬥，早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當年冒險犯難可歌可泣的壯舉，令人肅然起敬。六十八年六月七日吳先生不幸逝世，筆者同內子正在美國，未能參加其喪禮致祭未盡友誼深引為憾。茲將吳先生生前口述的一段經歷憶述如後，以紀念吳鶴齡先生，並表崇敬之忱。

雲王託商禦敵大計

抗戰前蒙古政務委員會全體會議，照規定，每年四月和十月，在內蒙地方各召開一次。民國二十四年第四次會議出席人員有委員長雲端旺楚克（通稱雲王以烏盟盟長兼任），委員兼秘書長德穆楚克棟魯普（錫盟西蘇尼特旗親王札薩克通稱德王，以錫盟副盟長兼任）和過半數的委員。錫盟盟長兼副委員長索諾木拉布坦（通稱索王）

，伊盟盟長兼副委員長沙克都爾扎布（通稱沙王）從來未出席。所以蒙政會以德王為中心，遇有大事，就由雲王作最後的決定。會議閉幕之後，委員們都懷着沉重的心情與憂慮，鄭重道別，各回原住地。吳鶴齡先生向雲王、德王辭行時，雲王拉着吳先生的手說：「這裏的情形和謠言，你已親見親聞，以我的看法，日本人不久會來奪取我們的地方，同時即將侵入長城，也不敢定。我們連日會商的辦法，恐怕於事無濟，中央準備不夠，一時不能大舉抗戰，恐怕也不能先來救蒙古，我連日深思焦慮，得到幾點意見。

「第一、我懇切的托付你（指吳鶴齡先生），回到南京，就把這裏一切情形，替我詳細報告蔣委員長，並且把我的意見向他說明，請他明白指示。①蒙古雖然人口少，力量薄弱，也有保國衛民，當仁不讓之心，請中央火速裝備蒙古，並派大軍北來，協力抗敵，蒙古自當負戈前驅，任何犧牲，在所不惜。②省縣長官，可於強敵來臨時，放棄地方，無法顧及人民，逃亡後方，以表個人的忠貞。但我們盟旗首長則不同，世守此土，由來已久，不但與人民有不解之緣，即牛羊駝馬，亦不忍捨之而去。蔣委員長倘不採取前項

辦法，就請指定西藏、新疆、青海或其他適宜地方，協助我們蒙古官民，帶着牲畜車帳，作一次古代式的大遷移，暫避敵鋒。③如果第二個辦法，也為蔣委員長所不取，就請容許蒙古暫時與敵人表面妥協，而實為保全地方，徐圖光復之計，也就是忍辱自全萬不得已的下策。但是無論至何等地步，蒙古人絕不會為敵人作鷹犬，傷害國家。不過和日本妥協的辦法，艱險而前途又十分黯淡，尤其非先得蔣委員長的諒解不能辦。④上述三項意見之外，如有其他辦法，凡足以保全蒙古有益國家的，蒙古無不樂從。我這些意見，煩你一一報告蔣委員長，請他明白指示。如果採取大遷移的辦法，我們須早作準備。」雲王的心似乎注重大遷移這一辦法。

雲王又說：「第二、蒙古各盟旗，向來各自為政，不相為謀，形成了一盤散沙。從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你（吳鶴齡）領着蒙古代表團晉京，擁護中央，要求自治，開成蒙古會議，建立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又促成了蒙古地方自治原則八項及蒙政會，蒙古這才走上團結進步的道路。不料日本強佔了東北，還要侵吞蒙古，只要天不絕蒙古，我們必須奮鬥到底。你這些年來的表

現，有熱心、有毅力，只顧公益，決不私自，所以蒙古官民都信服你。你得到 蔣委員長的明白指示以後，請你馬上回來，一定回來和我們共患難、同生死。我想你必能以民族的禍福存亡爲重，不會留戀你在南京的地位和安定的生活吧！」（那時吳鶴齡先生是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主任兼蒙藏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參議、參謀本部邊務專門委員、蒙政會委員及參事長）。雲王又說：「我已年邁來日無多，只要眼見蒙古不至於毀滅，死也瞑目」。說到此處，他已淚下沾襟。吳鶴齡先生接受了雲王一番懇切而又重大的託付，便帶着難以形容的沉重心情，經綏遠回到南京。

五全大會詳思出處

吳鶴齡先生回到南京，不多幾日，就以黨代表身份，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除了討論一般黨政軍事務及選舉中央委員以外，多半是商討日本侵略日急，如何舉國抗戰，如何收復失地等問題。吳鶴齡先生說：「代表們都是負有黨政軍重要責任的，滿懷義憤，羣情激昂。有的主張馬上抗戰而又苦於準備不夠。有的主張加緊準備而又顧慮日本戰力同時加強。另有少數代表，明知立即抗戰，勢不可能，却故意高唱不顧一切立即抗戰的高調，這一類人物以倒戈將軍馮玉祥爲首，居心困擾政府，也就是爲難 蔣委員長。最後 蔣委員長登台說明：『目前我國戰力遠不如日本之強，如果輕易抗戰，很足以亡國，我們不應以國家之存亡孤注一擲。』委員長又說：『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

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一旦抗戰開始，誓必奮鬥到底，決不中途妥協』。這是忠誠爲國的萬全之計，凡有理智的代表們，莫不擁護這種主張。可是馮玉祥和他的同路人，仍然吵鬧不休。於是 蔣委員長赫然震怒，大聲疾呼的說：『你們既要馬上抗戰，就請先簽名，我馬上分派任務，立即下令動員，我打前敵，盡我一切，決不怕犧牲，如有臨陣退縮的，一定軍法從事，如果不幸而就此亡國，你們要對全國同胞負責任』這一下子會場中立刻安靜下來，馮玉祥也退縮回去了。看光景，加強準備然後抗戰的策略，大致已經確定。我（吳鶴齡先生自稱）就感到雲王希望裝備蒙古派遣大軍的一項意見，是不能提前實現了。雲王的其他兩項意見， 蔣委員長如何指示，尙難預料。」

吳鶴齡先生說：「這對我聯想到個人出處的問題，如若安於現狀，只顧自己，仍然留在南京吧，那將大大的對不起雲王，而且心裏也絕對丟不下蒙古，良心上的譴責，是永遠痛苦的。又想去聯合蒙古官民，想法子應付日本人，和日本妥協，爲蒙古自保之計吧！便要蒙受附日的惡名，受萬人的唾罵。再以敵人仇視我的情形度之，很可能加我以阻擾蒙古復興的罪名。把我殺害，我死了不算，還要負種種的惡名，何以對得起祖先在天之靈呢？這是萬萬幹不得的。又退一步想，政府或者諒解我，敵人也許不害我，但是以敵人的精密嚴酷言之，豈能容我有所作爲？何況蒙古也有敗類受了敵人的威脅利誘，一定和我爲難。和日本妥協既不能達到蒙古自全的目的，白白的

冒千辛歷萬苦，又誤了自己的前程，那就太不值得了。因此種種考慮，去既去不得，留亦留不下，連日心煩意亂，寢食俱廢。這件事關係一生的生死榮辱，不能不慎重，不能不考慮。到了此時，又想取決於可靠的朋友，於是和蒙古駐京代表中最可靠的恩和阿木爾（喀喇沁右旗人）戴清廉（土默特左旗人）二人，密商幾次，他們驚訝遲疑之餘所說所見的，和我自己所想的差不多。在這些日子裏，蒙政會又三番五次的來電報，促我快回去。而雲王所委託的事情，也不能不早爲請示 蔣委員長。於是決心，公私一切全以委員長的指示爲從違，因爲他眼光遠大，料事神明，是我平生所最信仰的長官。」

晉謁蔣公請示機宜

吳鶴齡先生說：「我對於晉謁 蔣委員長請示雲王所託各節及我個人去留問題，考慮又考慮，躊躇又躊躇，一至遲到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始決定先和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先生一談，因爲朱培德先生對蒙古問題有研究，對我個人也很好。於是到他的公館去見他，說明一切情形，要求晉謁委員長請示機宜，朱培德聽我陳述意見後，極端贊成，並答應先爲報告委員長。三十日上午，他由電話通知我，叫我於下午三時去見委員長，我準時到官邸見到委員長，當將敵人西進，人心恐慌各情形，詳細報告。委員長說：『敵人一定要擴大侵略，不但蒙古同胞將遭一時災難，即華北同胞也恐難免，中央很覺對不起』。又說：『此時裝備蒙古已經來不及，集體大遷移豈不等於讓地盤，至於暫時陽爲應付實

圖自全之計，在不得已時，還可以實行。蒙古同胞忠於國家，我是知道的。』吳鶴齡又以雲王叫他回蒙古一節，請示可否時，委員長說：『可以。』吳鶴齡又請示同去之後，應當怎樣作法，委員長略加思索，便說：『敵人非常兇狠機警，此刻難說具體辦法，不過你可團結蒙古官民，隨時設法牽制敵人，使他們晚進一日是一日，少進一步是一步，一俟準備完成，舉國抗戰，收復失地，那是我的責任。』吳鶴齡先生說他當時曾說：『因為在中央日久，敵人非常注意，如果公開回去，敵人一定懷疑，不但有危險，也不易有所作為。必須秘密同去，到達內蒙古時，還請政府下令通緝，以便取信於敵人。向機聯絡蒙胞，打擊敵人，萬一不幸為敵人所殺害，還請委員長宣佈真相，以免我吳鶴齡永被惡名，辱及先人。』吳鶴齡先生憶述說：『那時候委員長很嚴肅的表示：『不怕犧牲就是革命精神，你慎重的去作吧，這邊的事，你不必操心。』（以後聽說，過了半年中央才免去吳鶴齡的職務）吳鶴齡抗戰前在南京七年多，每次見委員長請示的時間都不過五、六分鐘最多十幾分鐘，此次談話長達一小時。委員長垂詢和指示頗多，吳鶴齡都牢記在心，以為日後工作之指標。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八時左右，朱培德主任又有電話來請吳鶴齡到他公館去，見面之後，朱培德說：『委員長很嘉獎你的熱心和毅力，特送你一萬元（當時幣制以銀元為準）的旅費，請收下吧。此行任務艱鉅，多多慎重努力才好。』吳鶴齡在領謝之外，曾說明此去等於小卒過河可能馬上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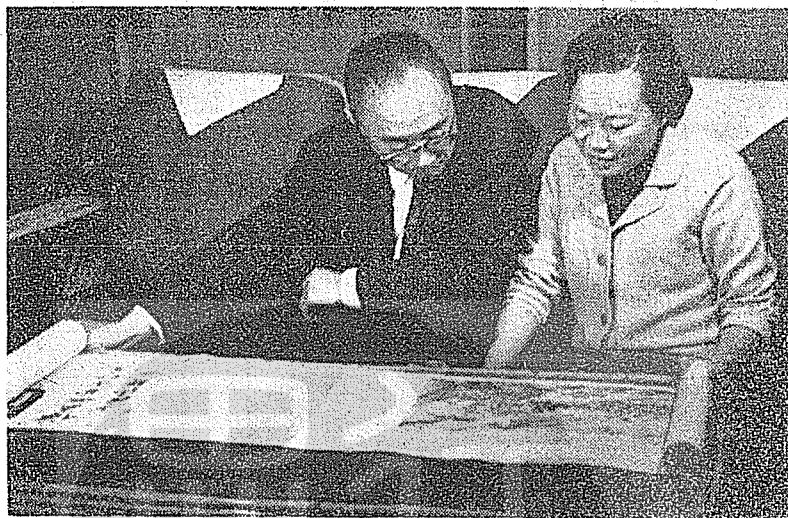
吃掉，但也許發生一點作用，因此打算不隨時作報告，以免為敵人所察覺，請以最後的結局作總報告吧！倘有必要時，當由蒙古駐京代表戴清廉代為聯絡。朱培德主任頻頻點頭稱是。半年之後吳鶴齡聽到朱培德主任因病逝世，非常感念，時隔多年還時常想起朱先生的音容，感念朱先生關懷蒙古的盛情。

以上是吳鶴齡先生口述擁護中央，聯絡蒙古同胞，暗中反抗日本冒險犯難，從事地下工作的片段經過。日本侵入蒙古地區後，對由南京回到蒙古地方的蒙古人特別懷疑，認為都是國民政府派來的地下工作人員，常以卑劣殘酷手段予以殺害。有一位察哈爾蒙古人尼光洲由南京回蒙古，在張家口、張北之間的路途中被暴徒殺害，就是敵人的暗殺份子所為。因此吳鶴齡先生由北平前往蒙古時，德王為防範意外特派精銳衛隊，以專車迎接吳先生。如當時無此項安全措施，則吳先生也許與尼某同一命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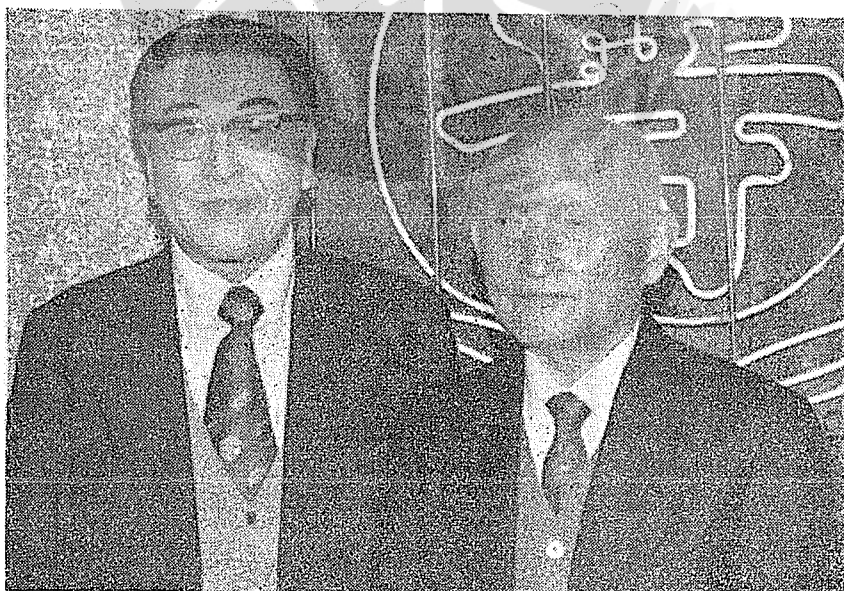
在鄉在台鞠躬盡瘁

吳先生到蒙古後，為安全計住在德王府，深居簡出，但他天生吃素，與一般吃素者不同，不但點滴葷味不吃，即別人用的碗筷，雖以沸水洗淨，但他一聞即噁心，何況蒙古地方肉類多蔬菜少，等於對他的口味開玩笑。好在他的隨員常川到張家口、北平購備素食食品及素食餐具。再為避免敵人的注意及陰謀，他就深居簡出，不在外露面等於籠中鳥，亦云苦矣。後來他在德王極力支撐下擔任了「參議部部長及政務院長」，但在敵人壓力下無法發揮長才，只能輔佐德王努力於

維護有限度的民衆利益。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後，蘇俄及外蒙軍隊侵襲內蒙，包圍張家口市，吳鶴齡先生隨同德王退至北平，在戴笠、馬漢三兩位先生的協助下隨德王飛往重慶，同行者有李守信、烏古廷、烏爾貢布等數人。飛抵重慶後，德王同吳鶴齡先生等晉謁蔣委員長，向委員長報告在敵人控制蒙古時期的守土衛民經過並請示日後蒙古自治事宜的努力方向。德王一行返平後，吳鶴齡先生即奉派主持蒙旗宣撫團事宜，致力於蒙旗復員及收攬人心工作，減少了部分蒙胞左傾趨向。來台後被聘為總統府顧問，光復會委員，光復會台南區邊疆組召集人。曾晉見陳故副總統辭修先生，面陳有關光復大陸後建設邊疆地區的構想，深得辭公的讚許。光復會的蒙古重建方案即是吳先生親自撰擬的。在台蒙古子弟由於離開蒙古家鄉並受新環境的影響，幾乎忘掉蒙語。在屏東的蒙人德古來先生倡導學習蒙語即在其住宅創辦蒙文班，台北方面張秉智先生主持此事。但由於各種原因兩處蒙文班均告停辦。吳鶴齡先生搬到台北後認為蒙文班教育蒙古子弟，學習自己語文儲備於光復大陸後，收復蒙古地區所需要的蒙古語文人才，非常有意義而重要，於是盡力促成在台北市恢復蒙文班並在泰山鄉、新竹、屏東等處增設分班。台北的蒙文班因無固定班址，輾轉借用各國校教室形同打游擊戰。後來吳先生忽患中風症不能繼續主持，遂懇託德古來先生接辦。吳先生早歲為國家民族奮鬥，晚年又為下一代蒙古子弟學蒙語而努力，誠為鞠躬盡瘁，病倒而後已也！



國畫家陳雋甫與夫人吳詠香（右）觀賞古
畫時留影（文見六十七頁）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崔垂言（左）與國大代表吳
鶴齡（右）合影（文見九十九頁胡格金台「蒙
族豪士吳鶴齡」）